

# 中国与欧洲：跨文化对话研究概述

赵晋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自2008年春季以来，中欧关系进入紧张状态，严重事件此起彼伏。奥运会火炬在法国传递受阻；中国方面取消中欧领导人年度峰会；法国总统坚持会见达赖喇嘛；西欧媒体对新疆事件富有倾向性的报道。为什么看来与中国并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欧洲会与中国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

中国和西方的分歧，从根本上来说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这源于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和互相不了解。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宗教文化，西方有强烈的优越感；西方既不了解中国的传统，也不了解现在的中国。对于许多富有天下主义和家国情怀的中国学者来说，批判性地学习西方现代文明是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而继承其精华部分也是当务之急。因此，开展中欧跨文化对话显得尤为重要。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模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同时也模糊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界限，使得某一个特定的民族的认同变得多重，具体体现在文化上就更是呈现了一种文化认同的多极化和非单一化。在中欧社会间进行跨文化的对话，必须聚焦于对中西方核心价值观的梳理和考察双方不同的观念世界，借鉴人类学的方法，或是在文化比较中体会人类的心灵共通点，或是在文化对话中理解文化差异和差异的合理性。

## 一、当今跨文化对话的紧迫性

新阶段产生了跨文化对话的空前的紧迫性。乐黛云将具体的表现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时空巨变。第二，对世纪一百年经验的反思。第三，文化冲突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全球人类的未来。第四，哲学的转向。只有充分把握自己文化的特点，对之加以现代思想的创造性诠释，并增强对他种文化的理解和宽容，才能促成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共存，相互对话沟通，形成全球性的文化多元格局。

## 二、何为西方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现代性等同于启蒙之后人对物质欲望的解放和合法性，或者意味着生产力的决定性发展。吉登斯强调，“断裂性”应该是研究现代性成长的路径。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解构现代性时，追溯了《旧约》中西方特有的宇宙形成观。西方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诸如需求驱动和自我愉悦，在西方传统中被视为人的自由意志，并且在文艺复兴后变为理性选择。因此，西方现代文化已深深植根于它的文化传统。

## 三、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

近年来，厦门大学周宁课题组一直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这一命题。他们认为，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中的首要问题，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以某种文化霸权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现代性身份的自我认同。二是西方的中国形象成为一种主宰叙事，影响着非西方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区域之间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及其知

识与权力网络。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中国形象恰恰是“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的问题起点，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基本上属于观念史范畴，如果进入实践领域，它则关系到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资源与战略问题。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研究对象是“思想”或“想象”，研究的问题却是当下国际文化与地缘政治战略的，如何使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国家战略研究结合起来。跨文化形象学是个全新的领域，论题正待开辟，方法也在探索中。

#### 四、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

文化审视绝不应该只来自外部，更应该有发自文化内部的自我审视。儒家的仁、义、忠、孝；道家强调的自由、容忍等，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核。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因为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应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向，也就是说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多位学者通过对中华文化的梳理，提出了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多元一体的基本面貌。例如，与西方不同的多种思维方式：执两用中，一分为三；五行相生相克；“反者道之动”；“负”的思维方式；以民为本的儒家观念等。同时，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并不仅仅包括儒学和道学，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自由主义等等。为了更好的理解当代中国，我们应当综合考虑所有这些影响。

#### 五、如何重新认识和构建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

中华文化的认同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儒学或道学的认同，而是一种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并经过当代重新阐释了的新的多元认同。在现代语境下重新建构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第一，应从单一的认同走向多重认同，在不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殖民和损害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全球化带给我们的更加开放的文化氛围，使得中国文化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了解。第二，走向一种超民族主义的文化认同，比较可取的策略应该是摒弃全球化话语中隐含的“帝国中心”思想，使其服务于中国语言、文化和思想理论在全世界的普及和传播。王宁指出，在重建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民族和文化认同中，经过后现代语境下重新建构的新儒学将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重建这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儒学”，并使之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另一种具有相对普适意义的理论话语，确实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它对于我们重新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着奠基性的作用，此外，我们也可以从后现代新儒学的角度对西方文化现象进行阐释，从而形成一个与西方的现代性理论话语对话的态势。

在关于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讨论中，石斌认为，国家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凝聚全民共识、维系国家认同的精神纽带，也是处理对外关系、塑造国家形象的思想坐标。急剧的变革导致传统与现代价值的激烈冲突，国家或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视线已然模糊。中国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但实力增长并不自动导致国家形象的改观。中国的崛起想必也不能单指经济增长，还包括政治进步与文化复兴。文化复兴当然包括价值体系与道德秩序的重建，因为道德价值观正是文化的核心。总之，重建国家核心价值观与外交价值观以适应全球化潮流和中国自身的变革，已经刻不容缓。无论“世界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由哪些要素构成，但毫无疑问，它必须“上承旧统下启新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充分吸纳合理的现代价值；既能够反映自身的历史经验、现实需要和价值取向，又能够适应世界基本潮流，反映人类共同的需要与“类”价值；既重视权力与秩序，也强调公平与正义。总之，我们必须“两只眼睛”看世界。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的重心在于改革开放，仅仅关注如何致富，1990年代起则主要追求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中国一直缺乏诸如民主、人权、公民权、科学和法治等现代文明的关键要素。因此，复兴中华文化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我们不仅要找回历史传统的精髓，也希望融入现代文明。

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建设首先必须依托自身的文化传统。倘若完全抛弃传统，缺乏文化自觉，则可能出现“自性”(identity)危机。我们民族的许多优秀思想文化传统，与人类的根本需求也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上也不能全靠古人替我们说话，还需要用现代观念、现代化的表述方式和表现形式去阐释、“激活”传统。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最大的困惑是如何实现自身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价值的合理对接。总之，面对多样的世界和多元的价值，我们必须有所选择，要选择就必须有标准。这最后和最高的尺度，无疑便是我们有待厘清和完善的核心价值观。

#### 六、中欧跨文化对话对化解文化冲突的贡献

基于上述有关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讨论，有学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是否可以互为主体，以使我们能够审视各自的文化？改变过去一味封闭地崇尚“国粹”，转而从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审视丰富的文化资源，特别是研究在当前的文化冲突中，中国文化究在化解文化冲突中可以作出积极的贡献。

#### 七、跨文化对话的方式和路径

在文化对话过程中，如何既保持纯粹，又能接受有益的影响，也是一个矛盾。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吸收不是一个“同化”、“混一”的过程，而是一个在不同环境中转化为新物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不同时机、不同选择、不同条件相互作用下创造出来的新物，不再有旧物原来的“纯粹”，但它仍然是从旧的“纯粹”中脱颖而出的新的“纯粹”。

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均衡发展的多元文化的世界，我们就应该有更深刻的文化自觉，同时对世界各地的文化更加了解，对于他种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描述，也要更加了解。只有充分把握自己文化的特点，对之加以现代思想的创造性诠释，并增强对他种文化的理解和宽容，才能促成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共存，相互对话沟通，形成全球性的文化多元格局。

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在反思与弘扬传统时，绝不能固执于特殊主义的文化存在，拒绝对话、呆滞于全球化的过程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发挥传统的建构性作用，在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时空语境中，对现代化与全球化、现代性与全球性进行反思，从而更好地走向未来。在全球化所凸显的文化特殊主义与普通主义的矛盾中，立足本土性的文化认同与存在、走向全球的普遍主义的对话与理解才是最切实可行的基本立场与策略。